新工人藝術團：一場大地上的社會實踐

三聯生活周刊 新工人藝術團 2016-11-11

新工人藝術團：一場大地上的社會實踐

 在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當我第一次見到許多時，他穿著一條肥大的褲子，正在和認識不久、喜歡詩歌與音樂的小兄弟小海抽煙聊天。在這個與京郊許多農家院相似的院落裏，依次分布著新工人劇場、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和同心互惠商店。作為工友之家的活動場所，這裏也是皮村3萬多外來打工人員聚集學習的地方。走出院落，沿著皮村的小巷拐幾個彎，路過一片正在施工的建築工地，便來到書聲瑯瑯的打工子弟學校——同心實驗小學。這所有400多名學生、涵蓋幼兒園與小學教育的學校，成立於2005年。

　　蔚藍的天空，不斷有轟鳴作響的飛機劃過天際，由於坐落於首都國際機場附近，幾乎每過一兩分鐘，就會有一架飛機經過皮村。許多剛從距此60多公裏的平谷張辛莊過來，在那裏的工友之家文化教育培訓基地，他和團長孫恒作為樂隊主唱，與鼓手姜國良、貝斯手孫元、吉他手龐巖剛剛排練完畢。月底，新工人藝術團將赴成都舉辦一場“大地民謠”的音樂節。最近一段時間，剛好趕上平谷桃子成熟，他們顯得分外忙碌，除了排演節目，還要幫全國各地的消費者郵寄桃子。在附近一片占地30多畝的桃園上，他們與當地村民以合作社的形式搞了一個同心桃園，用以支撐2010年在這裏成立的工人大學與工友之家其他活動的支出。

 這些簡單勾勒的社會活動版圖，仿佛一片湖面的波紋，一圈圈擴散開來，影響著越來越多的打工人員，或者說他們更願意稱之為“新工人”的龐大群體。很難想象，波紋的中心是成立於2002年5月1日的一支草台樂隊——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團隊核心許多與孫恒，也只是那個時代懷揣音樂夢想眾多“北漂”中的普通一員。在和他們聊天的過程中，我情不自禁地想起10年前自己在北大南門附近的考研生活，這也讓我相信，那些聽到他們歌曲的打工者很難不泛起一種感同身受的漂泊無依之感。

 從自我的表達，到對周圍世界的關註，再到音樂之外的種種社會實踐，如同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墻上貼著的“打工三十年歷史圖”，他們走出很遠的路，究竟如何在確立自我的同時，一步步刻寫下時代的烙印與記憶？

“世界很臟，但你可以選擇不妥協”

新工人藝術團：許多

　　“有時候覺得自己和世界是個爛攤子/寫首歌站起來和它繼續幹/皮村的月亮圓圓掛在天上/唱一段家鄉的小曲來給你聽。”許多起身抱著吉他，彈唱了這首創作於不久前的《我們》。他的嗓音條件算不上很好，但有一種低沈的內在激情，爆發力也好，這一點似乎受到他早年喜歡的英式搖滾影響：主歌低沈迷幻，副歌瞬間爆發。

 1997年，許多在浙江海寧的家鄉高中畢業後，由於成績不理想，沒有接著讀大學。整個高中時期，性格內向敏感的他都處在一種壓抑狀態，想讀文科，但分到理科。高三的一天，教室裏放著音樂，他站在窗口望著外面的落雨，仿佛突然間被當時的畫面觸動，想當電影導演。然而這個少年時的夢想，很快發生了轉移。畢業後，許多在舅舅的安排下，去杭州臨平鎮當了一名戶籍協警。上班第一天，就看到同事打人，那種社會角色對人的異化，令他記憶深刻。那段時間最大的慰藉來自新認識的一些朋友，大家一起聽搖滾聊音樂。其實早在1994年，剛參加完中考的許多無意中在電視上聽到張楚的《姐姐》，便開始喜歡上了搖滾。有次他喝酒之後唱歌走回校門，看門大爺告訴老師有學生耍流氓，唱著“牽著我的手，你不要害怕”。

 　“整個世界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不按它的邏輯就會被甩出去。我當時想應該有另外一個世界，可以去表達內心深處的真實。”1999年，許多辭掉協警工作，前往北京迷笛音樂學校學習。那所後來被圈內人稱為“地下搖滾音樂搖籃”的學校，當時剛剛成立五年，頗有一種烏托邦的氣質。大家一起學琴，互相蹭飯，在這塊心目中的“最後一個靈魂收容所”抱團取暖。與其他同學相比，許多幾乎沒有音樂基礎，“剛開始抱著吉他不知道怎麽彈，但隨便撥拉就感覺很興奮”。

 每天練琴8小時，兩年多的校園生活，許多系統地學習了音樂，更重要的是，明確了一種生活態度——“世界很臟，但我們可以選擇不妥協。”彼時，音樂成為他最好的表達工具。畢業後，他與一些玩地下搖滾的朋友住在霍營，靠在地下通道賣唱為生。“一天掙七八十元，好的時候有一兩百元，我會算下每月開支，一周出去幾天，掙夠就行。”許多說。

 比許多大兩歲的孫恒，辭掉在老家河南開封一所中學音樂老師的工作，早一年來到北京。那是一種帶著迷茫的逃離。打了幾個月零工，1999年初，孫恒帶著花了800元在電影學院錄音棚錄制的第一張專輯《梯子》離開北京，在全國十幾個城市的地鐵站、地下通道與高校演唱，開始他當時所謂“民謠之旅”的個人活動。

 早在安陽師專藝術系音樂教育專業就讀的第一周，孫恒就開始組樂隊。更早的基礎，則來自一個青澀少年表達的需求。孫恒在陜西安康出生，中學時才被父母帶回老家開封，最初由於語言不通，性格變得異常孤僻。一次元旦聚會，他結結巴巴唱了一首當時流行的《信天遊》，引來全班同學哄笑。帶著倔強的自我證明，他騙父親以學英語為名買了一台收錄機，天天練習，很快唱得很好。讓他至今引以為傲的是，高二時的中秋節，他熬夜寫下第一首歌《想家的時候就想想我》，第二天利用班長的職權之便，教大家學唱，引來鄰班同學，一群孩子哭得一塌糊塗。後來這首歌的曲調，還被用於頗有影響的打工歌曲：《天下打工是一家》。

 1999年，孫恒覺得找到了自己的音樂表達風格——民謠。如同他喜歡的伍迪·格思裏，一輩子流浪民間為底層人民寫歌，在他看來：“音樂不僅是表演給別人看，更重要的是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對社會的認識，對生命的看法，講述自己關註的社會議題。”確切地說，那種轉變來自於一年多的漫遊生活。

 “社會上普普通通的勞動者教育了我。”其時，孫恒接觸到各行各業的社會最底層：服務員、保安、建築工人，還經常被警察抓起來。一次，他在一個建築工地停留了三天，每天傍晚等工人下班後為他們演唱。這期間，孫恒認識了一個叫彪哥的工人。前兩天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坐在旁邊，第三天，他把一雙手伸到孫恒面前，開始講心裏話：“我只有一雙空空的手，但我要靠這雙手養活家人，每天幹十三四個小時特別累，累了就喝酒，喝完就想家。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麽從農村來到城市，用血汗建設城市，城裏的人卻瞧不起我們。”受到觸動，孫恒很快寫了一首叫《彪哥》的歌。彪哥，讓他的創作開始發生顛覆性的變化：走出自己，關註世界和別人。

2001年，許多的賣唱生活已經繼續了兩年。“9·11”那天，他背著吉他正在西直門附近的一個地下通道唱歌。一個不認識的哥們跑來借錢，跟他說：賣唱時，吉他被警察沒收，需要100元贖回。“出於一種階級感情，我把當時掙的錢都給了他。”許多說，不久後，在這位哥們的介紹下，許多認識了孫恒。那年冬天，幾個人開始商量組建樂隊，為工人演出。半年後，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正式成立。

走出自己，關註世界

　　此前在天津工地上的一次演出，使孫恒觸動很深。天氣很冷，工人們的熱情卻讓他體會到那種無法替代的價值。“跟你去酒吧表演完全不同，工友們坐在旁邊，開心時卷起袖子，跟你一起鼓掌，難受時跟你一起哭。”孫恒說。新工人藝術團核心成員許多

　　1999年底，孫恒回到北京，由於經常跑去各個高校聽講座，與一些學生社團也漸漸熟悉起來。一次，在北京師範大學“農民之子”社團舉辦的一次講座上，他聽到明園打工子弟學校校長張歌真所講的辦學經歷，第一次得知北京每年有幾十萬打工子弟因為戶籍限制無法上學。聽完講座，孫恒舉手報名，第二天便去那裏當了音樂教師。此後三年裏，他在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做志願者教音樂，通過孩子們，也接觸到那些在北京從事最苦最累職業的父母。“了解了他們生活的艱苦和訴求，這也是我後來從事與工人群體相關工作的原因。”孫恒說。

　　這期間，孫恒也認識了剛剛創辦《中國改革·農村版》的溫鐵軍，以及《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作者李昌平。在這些學者的引領下，他參與了雜志的試刊，開始關註“三農問題”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工人問題。

　　在孫恒的引介下，許多開始看溫鐵軍、李昌平的文章。“以前還沒有看到過對社會這樣深刻的剖析。”許多開始慢慢建立與社會的聯系，找到自己作為勞動者的立場。盡管那種把自己打碎重新建構的過程與轉變，充滿痛苦，但一些共同的生活經驗則把大家連接起來。許多仍記得，2001年申奧成功時，大家興高采烈地聚在一起看電視，遇到聯防隊員查暫住證，只得紛紛逃散。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引發收容制度被取消前，為了逃避檢查，他們往往在門外掛把鎖，以制造不在家的假象。

　　“以前寫歌，歌詞都是‘我’怎麽樣，這首歌用了‘我們’。當時收容制度還沒取消，特別想吶喊。以前一個人的吶喊可能還沒底氣，後來覺得大家都一樣，和一個群體結合在一起後，感覺有了吶喊的底氣。”2002年下半年，許多為工人寫了第一首歌《打工號子》，歌詞這樣寫道：“我們進城來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幹。誰也不比誰高貴，我們唱自己的歌。”

　　成立演出隊後，團隊成員創作了大量打工歌曲，開始大規模為工友演出，哪有工地，就跑去演出。盡管一些老板覺得奇怪，有時他們也會碰壁，但去了之後工人都很歡迎，一些場景恍如歷史重演：“李昌平老師拿著雜志，在工人宿舍發雜志，發表演講，我們在那兒唱歌。”

　　2003年，演出隊改名打工青年藝術團。2002年11月，農友之家以企業形式註冊成立，並於2006年改名工友之家。許多解釋，因為藝術團想做更多的事情，背後需要一個正式的機構。一次在西北旺演出時，由於缺乏經驗，直接貼海報宣傳，結果被村委會叫停。後來，大家摸索出“三方共建”的演出模式：居委會給政策，打工子弟學校給活動室，藝術團做演出。在孫恒的理解裏，成立農友之家的想法很簡單：在城市為工友成立一個家。打工人員在城市面臨困難與孤獨，卻缺乏鄉土社會原有的互助網絡作為支撐。

　　最初三四年裏，盡管受到各方關註與支持，團隊的迷茫並非沒有——演出的意義究竟何在，歌曲真的能發揮那麽大作用？誰敢說這不是另一種形式的自娛自樂？在平谷的辦公室裏，孫恒帶著一絲自嘲說：“《團結一心討工錢》，唱了10年，拖欠工資還不是照樣發生？”

　　然而，文藝的浸潤原本緩慢，以迫切的功用要求，原本不切實際。除了自己內心感受到的個人價值，孫恒也從一些遇到的事情找回答案。

　　一次，一個在甘肅敦煌打工的小夥子，由於被老板拖欠工資，郁悶之下跑到小酒館喝酒，無意中在電視上看到藝術團參與錄制的一期節目。當時正在放《團結一心討工錢》，小夥子聽完後激動之下把桌子掀了，回去找老板討工錢。後來又輾轉找到藝術團，給他們講述自己的經歷。有時，孫恒走到街頭無意中聽到自己創作的歌曲，意識到音樂自身擁有的意義。

 《團結一心討工錢》創作於2002年。當時由於相當多的市政工程層層轉包，建築工地拖欠工資的現象非常普遍。幾十名四川建築工人，幹到年底卻被拖欠工資，工人們將老板堵在房中，從傍晚一直談判到天亮，最終成功拿到工錢。孫恒最初聽到這件事時，非常振奮，希望將其寫成歌唱給其他工友聽。他采訪到幾位討薪工人，將現場工人的對話加入背景音樂，寫出這首頗具敘事風格的民謠作品。“那是一首工友們最喜歡聽，老板最不喜歡聽的歌。”有次在北航一個建築工地演出，唱到一半，現場200多名工人舉著拳頭跟台上歌手一起喊口號，老板被嚇壞了，很快終止了演出。後來，孫恒有了經驗，再去工地演出，便將這首歌放在最後演出，唱完走人。

　　2004年，對藝術團來說是頗為關鍵的一年。為了教工友唱歌，團隊在錄制歌曲時，無意中認識了京文唱片的一位工作人員。對方聽了之後很有興趣，將小樣拿給老板許鐘民聽，沒想到建築工人出身的許鐘民聽後非常震動，承諾即使賠錢也要幫藝術團發出專輯。藝術團這張《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專輯，最後賣了10萬張，超過國內一線歌星成績。這次意外的成功，也讓孫恒、許多有了新的選擇。京文當時想將他們簽為旗下藝人，但由於想做更多的事情，他們放棄了這次機會。

 專輯兩年的發行權，給藝術團帶來一筆7.5萬元的版稅。孫恒回憶，當時自己一個月在打工子弟學校的收入才400多元。團隊為此開了一個星期的會，商量怎麽花這筆巨款。討論的結果是，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自此，藝術團展開一系列與工人教育培訓相關的事業。

新工人：教育與身份認同

　　2005年，藝術團來到朝陽區金盞鄉皮村，用那筆唱片版稅作為啟動資金，租下一個荒廢的工藝美術廠，準備改造之後作為小學校舍。為節省成本，孫恒動員了1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志願者，再加上附近的一些工友，一起動手改造校舍。在孫恒的描述中，那是一幅頗具烏托邦色彩的勞動畫面：“七八月間，天氣很熱，大家白天一起幹活，晚上聯歡唱歌，非常熱鬧。”一個半月之後，校舍改造完畢。大家又跑去聯系企業，希望對方認領大到教室小到報欄的各項設施，以冠名換取資助。而小操場上的籃球架，則以每斤3元的價格，購自廢品收購站。

 同心實驗小學最初的骨幹老師，來自孫恒和許多之前工作過的打工子弟學校，大學生志願者也是重要的補充力量，此外，藝術團成員也兼職為孩子們上一些體音美方面的課程。招生的困難似乎遠小於打工子弟上學的困難，學校第一學期就招收到100多學生，最高峰時達到800多人，此後長期穩定在四五百人左右。但困難仍遠超孫恒最初的設想，他說：“當時年輕，腦子一沖動就辦了學校，沒想到辦學這麽困難。”租下場地不久，村裏的地痞就在大門鎖了兩把大鎖，索要一把1萬元的開鎖費。後來，在村委會的幹涉上，事情才得到解決。難以確定的還有政府對於打工子弟學校政策的變化。出於控制人口的需要，近幾年來，北京市逐步取締打工子弟學校。2013年，鄉政府要關停同心實驗小學，推土機開到門口，還切斷了學校用電。300多名家長堵在門口，最後在溫鐵軍、李昌平、崔永元聯名公開信的呼籲下，以及社會各界關註下，同心實驗小學成為那波關停風潮中唯一幸存的打工子弟學校。

 孫恒最初對小學“社區學校”的設定，不同於其他打工子弟學校。諳熟打工家庭的生存狀況，他認為以文化教育方式服務工人群體，關鍵在於人的改變，打工者思想觀念與權利意識的覺醒。除了學校教育，對孩子的教育還包括家庭教育與社區教育。利用晚上和周末空置的教室，孫恒組織大學生與學者為工友上課，課程涵蓋親子教育、法律常識、電腦、英語，以及文藝興趣。

 2010年，“富士康事件”之後，工友之家在平谷創辦工人大學，更多關註年輕工人的生存狀況。名為大學，這裏其實更像以“立人”為本的職業培訓學校。孫恒介紹，招收學員主要為16～25歲、有過打工經歷但仍想學習的年輕人。在一期6個月的免費學習中，除了培養學員的專業技能，更重要的目標仍在於轉變他們的精神與價值觀。孫恒為這所社會化學校所設立的最低目標是“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最高目標則為“擁有社會資源後，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2007年5月1日在北京朝陽文化館前，打工青年藝術團為附近工地的打工者演出節目

 換個角度看，工人大學所培養的正是未來的社會工作者。孫恒告訴我，在學校已畢業的200個學員中，至少有50人從事著社會工作。他的辦學理念部分來源於愛人呂途的調查研究。在2010～2012年，呂途訪談了100多位青年工友，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中，揭示了在“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的時代背景下，比起生存壓力，打工者群體精神的整體迷茫更為可怕——要麽發財致富，要麽一輩子打工。即使有想法，在時代洪流面前仍難做出改變。

 文化教育則帶來精神的解放，這種思路還體現在許多所帶的民眾戲劇課程。借用巴西戲劇理論家奧古斯都·波瓦的理論，許多希望通過戲劇的方式，將打工者的身體與內心打開，使他們成為日後“表達的組織者”。課程的設置循序漸進，許多開始會為大家設置一些互動性遊戲，打開身體束縛。“比如在一個空間根據不同節奏行走，喊停的時候，原地擺出一個日常工作中的造型。”此後進行分組，訓練大家用身體講故事的能力，開始是簡單的寓言故事，要求用四幕凝固的雕像講述，之後加入對話與即興表演。結課時，每組學員以討論的方式，“預演大家現實生活中可能碰到的問題”。

 2006年，打工青年藝術團改名新工人藝術團，名詞改換的背後是新的身份認同的浮現。在呂途的著作中，“新工人”區分於國企的“老工人”，比起“打工者”這樣的中性詞，包含著更多的訴求與主體認知，“農民工”則成為詞不達意、帶有歧視色彩的過渡詞。一直以來，藝術團成員對這種身份的認同頗為敏感。2009年1月，在皮村舉辦的“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民謠專場上，一位演唱者由於堅持使用“農民工”一詞，差點與藝術團另外一位骨幹成員王德志大打出手。

互助網絡與合作社

　　2010年起，孫恒在工人大學負責講授三門課程：工人文化歷史、社會資源與團結經濟。面對這些聽起來非常宏大的課程，孫恒稱，自己只是通過藝術團的案例來講這些課程，希望引發大家對一些問題產生新的看法。指著辦公室的一張桌子，孫恒對我說：“許多人抱怨沒有條件做一些事情，確實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單靠自己根本無法完成。如何調動大學生、志願者、閑置資源，取決於思想上如何看待資源。有了新的看法，做法才會改變。”

 2006年，工友之家創立同心二手商店，便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典型案例。起初，藝術團去工地演出，會免費發放一些在社會上募集的衣物，遭遇瘋搶。孫恒後來反思，“4雙鞋被8個人搶走”，大家未必能用，效果並不好。後來，大家想到辦二手商店，用更為持續的辦法，為城鄉結合部生活壓力巨大的工友提供幫助。售賣的東西均來自社會捐贈，多為和工人生活密切相關的用品。“一件夏季衣物最高不超過10元，被子也就七八元，羽絨服也不超過20元錢。”這樣一來，工人花錢購買物品肯定為自己所需，同時不失尊嚴，營業所得也可支持商店運營。至今，工友之家已擁有15家二手商店，在解決了50人就業的基礎上，每年還有二三十萬元的結余，用以支撐團隊做更多的事情。

 在孫恒看來，工友之家是互助網絡，工人大學畢業的學員之間也會形成一個社會互助網絡。將之進一步擴大，便是他們在平谷建立以同心桃園為核心的合作社模式。

 這種20世紀70年代起源於瑞士的社區支持農業（CSA）模式，其實並不新鮮。當地桃農以合作社方式加入同心桃園，每年只需按照綠色有機的方式養護桃園，營銷由合作社以認領桃樹的方式解決，收益與農戶對半分成，風險則由合作社與客戶分擔。孫恒舉例說明：“有一戶農民，老兩口兩畝地上有120棵桃樹，辛辛苦苦種一年，自己拿到市場賣，毛收入只有1萬多元。加入合作社後，認領一棵樹800元，分一半給農民，年收入便能提升到4.8萬元。”問題在於訂單，孫恒稱，300多棵桃樹，今年已基本認領完畢。訂單越多，便有能力使更多的農戶加入合作社。孫恒希望，桃園日後的收益可以負擔工人大學的資金投入，用社會化的方法，擺脫傳統非政府組織模式對資金的依賴。

 繁重的社會工作，顯然擠占了藝術團成員的音樂創作與演出時間。雖然演出頻率有所降低，但孫恒表示，音樂與藝術是組織的源動力，永遠不會中斷。藝術團一旦建立自主持續的經濟基礎，將騰出更多精力演出。此外，還會搭建平台，讓更多年輕人一起加入。

 　“如果一天不唱歌，那生活會變得多麽無趣。桃子忙完了，我們就去全國各地唱歌。”幾個月前，孫恒睡覺時被空氣中的霧霾嗆醒，寫了一首關於環境問題的歌曲《紅色警報》。而在夜色籠罩的皮村小酒館裏，許多喝了點酒，唱了一首創作於今年5月的新歌《紅五月》：“這個世界讓人單調地幻想/打工的人自由地無處可去/當看到自己，我有些憂傷/當看著世界，我熱血沸騰/歷史旋轉著向前/感覺又回到了後面/你是一個五月的青年/那就一起解放想象，行走人間……”。